

中文文艺论文 年度文摘

ZhongWen WenYi
LunWen NianDu WenZhai



2010年度(下)

陶东风
张未民 / 主编

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
文学理论：为何与何为
诗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
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亚人文地理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艺术学的六大讨论焦点
文化的物化年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文文艺论文 年度文摘

ZhongWen WenYi
LunWen NianDu WenZhai



2010年度(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 2010 年度 / 陶东风, 张未民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097 - 2741 - 6

I. ①中… II. ①陶… ②张… III. ①文艺评论 - 中国 -
2010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078 号

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 (2010 年度) (上、中、下)

主 编 / 陶东风 张未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梁艳玲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李 娇 杨艳敏 宋建勋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56.75

版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1012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741 - 6

定 价 / 178.00 元 (上、中、下)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学批评论文

「 编 选 咨 询 专 家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

——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

· 张清华 ·

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代诗歌与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变革”与“保守”之间的冲突，这一逻辑在更早的时候表现为“革命”与“守旧”之间的对立。尽管性质不同，但关于文学和诗歌的基本评价都是以时间逻辑为标尺的，谁在“新”的序列中占据了前沿，谁就占据了价值的制高点。而近十几年来，这种“时间的神话”^①——文学的流动性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了，日益明显的则是空间丰富性和差异性的展开。表现在研究话题中的一个趋势便是，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偏离对“趋势”的谈论，而越来越专注于对“格局”的观察和认识了。

预言当代文学和诗歌中“时间神话的终结”无疑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判断。但是在十几年来当代诗歌研究中，关于可以替代它的“空间性”的分析，却与当代诗歌日益复杂的状况与丰富的特质不相匹配。本文当然也无力整体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提出来以期引起更多关注与讨论。

一 为何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当代诗歌

文化地理与诗歌中的地方文化与地域美学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有史以来一切文学无不自然地带上了地域文化色彩，同时人们对于一切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很自然地借助其产生的环境来予以观察。黑格尔说：“爱奥尼亚的明媚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歌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为什么注定要出现更多荷马的地方没有出现呢？因为“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就没有出

^① 参见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过诗人了”。^① 孔子在褒奖《关雎》“乐而不淫”的同时，又认为“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显然，他们都意识到文学和诗歌的某种地域性特质，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和诗歌的先天影响作用。然而这些认识和谈论角度在文学和诗歌研究中通常被人们忽视了，原因是在很多年里，价值判断中的历史和时间维度占据了绝对主导。

这一逻辑的始作俑者当然也可以归于黑格尔，他曾宣称：“世界的新与旧，新世界这个名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给我们知道的。”^② 也就是说，“现代”概念的产生，是因为一些“落后”的地理文明的发现，才证明了所谓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的性质之分；但是他所创造的体现“历史理性”的必然论和进步论逻辑，却成为主导世界的价值观将近两百年的主要思想方式，“新世界”和“时代精神”这些概念正是在他那里才成为一种新神话。在福柯那里，上述观念遭到了强有力的反思和批判，他说：“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总之，“19 世纪沉湎于历史”。^③ 一位当代历史理论家爱德华·W. 苏贾也随之指出：“在 1980 年代，学者们一致呼吁对（历史的）批判想象需要进行广泛的空间化……因此，一种具有明显特色的后现代和批判的人文地理学正在形成。”它“重新将历史的建构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和人文的构筑和构形结合在一起。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中正生出各种新的可能性”。^④

上述理论观念足以成为一个理由，让我们来讨论“中国当代的诗歌地理”这一诗歌和文化命题。在过去的 100 年里，我们一直是在时间的范畴中来讨论新文学和现代诗歌的，时间使现代文学和诗歌的历史具有了某种价值和方向，从陈独秀所说的“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进化”，“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⑤ 到 80 年代初期徐敬亚所宣称的“新的，就是新的”，^⑥ 所使用的都是这样一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 82 页，第 83 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82 页，第 83 页。

③ 福柯：《地理学中的问题》，转引自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 15 页。

④ 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 17 页。

⑤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 年 2 月 1 日。

⑥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 年第 1 期。

种逻辑。直到眼下的所谓“现代性”和“全球化”讨论，也仍是如此。人们谈论文学包括诗歌的基本观念仍习惯于使用时间维度所派生的价值标准。然而正如英国人彼得·奥斯本所一针见血指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都是历史的范畴，它们是在理解历史整体的水平上建构而成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将“历史总体化”的结果，是一种“与这些时间化相关联的……历史认识论”，因而也是一种“特定的时间的政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反动一样——侵入了时间的政治的领域”^①，奥斯本尖锐地揭示了“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虚构”所体现的西方社会的霸权与统治力量。

有意思的是，对于文化地理的发现，恰恰使中国人认同了时间的价值逻辑，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侵袭与催逼之下才“睁了眼睛看”，具有了启蒙和现代意识。一切都是从魏源留下的那本《海国图志》开始的，有了作为“文化地理”的《海国图志》，才有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他自己写的《原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进化论”历史观才得以萌生和确立。而对于西方来说，文化地理的发现则同时催生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怀——转而怀念古代、中世纪、东方的原始森林与陌生的异域情调。斯达尔夫人正是从欧洲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差异中，解释文艺复兴、古典主义与19世纪初欧洲文学的动力，并且提出在地理的差异（欧洲北方和南方）中包含了时代和价值的对立（古代和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希腊罗马制度的对立）^②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到了中国人这里反过来了，在古今之争中，包含了陈旧与现代、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因此，关于中国现代历史包括文学与诗歌的历史的叙述，显然也充满这样的虚构与规则：“改良”、“革命”、“变革”、“进步”、“先锋”、“新潮”、“后”、“新新”、“后后”……这样一些概念，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文学进步的观念神话。不止五四时期，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时期、延安文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文革”后的“新诗潮”运动、超越“朦胧诗”一代的“新生代诗歌”等等，无不遵从这样的逻辑。在这样一个历史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确实是一直在变，但却未必总是在“进步”。

因此，对这样一种评价角度与思维逻辑予以修正，在如今的文学格局下

① 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3～4页。

②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141页。

便显得非常有必要。因为在“变革”出现了某种“停滞”之后，诗歌反而呈现了一种空前丰富，原来“代际的对立”更多地变成了“地域的分野”，所谓“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分立，“外省”与“京城”之间的对峙，在当代诗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状况。这表明，地缘文化关系、文化地理差异对诗人和诗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不同地域的诗人群落则日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合理性，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如广东地区诗歌所集中体现的底层生活场景，以及那里无比热闹的诗歌景观；再如北京地区诗歌所显露出的国际化、其政治波普性、前卫文化属性与中产阶级属性等等；而大西南地区的诗歌则更加自觉地呈现出其原始和荒蛮的气质。这些都为我们考察其格局的变化和地域差异提供了鲜活的对象和材料。

二 中国当代诗歌地域文化特性的演变

但是，“空间”维度的考察，也仍然需要从“时间”流变的角度加以回顾和审视。

中国当代诗歌的地域性，在早期的革命洪流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统合作用下，曾显得十分模糊，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诗人就相应号召奔赴各地，在一线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与资源，但写出的作品却鲜有风格的区别。唯一可以显示一点地域特色的例证似乎是闻捷，他在 1955 年出版的《天山牧歌》，因为带有相对浓郁的边地风光与异域情调而受到欢迎。其中对哈萨克青年男女的恋爱场景的描写尤为吸引人，这也应了欧洲传统中主流的说法，所谓浪漫主义其实就是指“异域情调”，如勃兰兑斯所说，即是“文学中的地方色彩”，“所谓地方色彩就是他乡异国、远古时代、生疏风土的一切特征”^①。闻捷诗歌中浪漫意味的获得，除非借助于这种边地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与生活情境，否则连基本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写姑娘和小伙子之间缠绵的爱情，大胆直露地倾吐表达，都几乎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健康美学”相冲突。因此，连作者也对此感到难于处理，只好在结尾处加上概念化的“升华”：“要我嫁给你吗？你的胸前少了一枚奖章”，要问我们的婚期在什么时候吗？“等我成了共青团员，等你成了青年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诗歌中既无真正的浪漫主义，也很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 19 页。

难谈得上有真正的文化地理。

上述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是就公开出版物或主流文艺生产而言。而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北京，特殊的环境，如权力的交叉与纠结状态所生成的特殊庇护（许多青年是因为出身高干家庭而享有某些特权，并有机会了解到更多权力秘密），如特殊阶层思想的活跃与信息暗道的畅通（在北京青年中私下流行的“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启示，使他们有条件接受到长期禁绝的外国文学和哲学，特别是现代派哲学与文学的影响）等，这些都催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样态，即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所记载的“地下沙龙”，这些遍布北京的思想群落中孕育了后来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和《今天》中的大多数诗人，^① 这样的特殊形式除非是在北京，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想象其存在。地下沙龙是当代中国最早的自由思想群落，也是具有鲜明的北京地域特点的诗歌群体，这中间的重要人物如赵一凡、食指、根子和多多等，都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1978年10月贵州诗人群创办的《启蒙》和1978年底北岛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今天》，可以看做是“民间”的具有“文化地理”意义的诗歌现象出现的标志。这两份民刊，一份出现在偏僻遥远的贵州，一份出现在京畿要地，实在是非常值得思考玩味，要么是文化稀薄天高皇帝远的边地，要么是在思想活跃炙手可热的政治中心，在其他地方则很难想象。但是，远在贵州的《启蒙》，诗人们并没有丝毫注意到那里的地方文化、民俗风物，相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传达了社会变革与思想启蒙信息的急切先声，而且是更为激进地采用了“诗歌大字报”的方式，奔波数千里到北京予以张贴；而身居北京的诗人北岛则在给贵州诗人哑默的信中说，“我们打算办一个‘纯’文学刊物，所谓纯，就是不直接涉及政治……应该扎扎实实多做些提高人民鉴赏力……的工作”。^② 这表明，两个群体中更加洞悉政治时局的北京诗人反而更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和专业性，而不主张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上述比较也许意义过于简单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特性是在“体制外”的民间诗歌群落中发育和体现的。原因很简单，主流的写作已经高度“一体化”了，只有在民间诗歌场域中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差异性。1980年代中期，这种差异终于借着“第三代”的崛起显现出来。1984

① 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② 北岛在1978年底给伍立宪（哑默）的信，未刊。

年，韩东在南京组织了“他们”，标立出一种平民化的诗学姿态，提出了反对诗人作为“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的角色，而还原为世俗身份的口号，并转而去寻找“民间和原始的东西”。^①同年2月，李亚伟、万夏等人则在同样的世俗化社会思潮的催动下创立了“莽汉主义”诗歌群体，主张对传统和现存的一切予以大胆冲撞；稍后，受到“宇宙全息论”和文化人类学思想的启示，四川的部分诗人石光华、杨远宏、宋渠、宋炜等人又组织了“整体主义”群落，强调以“现代史诗”的方式对民族文化进行“整体状态的描述或呈现”。这三个诗人群体成为当代中国民间诗歌美学爆炸的导引和先声。1986年，在徐敬亚等人的策划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一举推出了数十个诗歌团体与流派，一时泥沙俱下、旗帜纷呈，当代诗歌的格局也陡然为之一变，自此生机蓬勃、群雄争逐。

可以说，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发育是从南方城市和偏远的山区兴起的，当以北京的部分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获得了新权威地位的时候，南方和大西南地区更年轻的一批写作者向他们发出了有力的挑战。这当然不只是因为那里的写作者们由于携带了更多自然的气息而更富有诗意，而且还因为他们携带了更符合当代中国现实经验的、更加平民化的文化观念，因而才更富有生长性。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占到最大比重、起到最显著作用的，当属四川的诗歌群落，在由发星整理的《四川民间诗歌运动简史》一文中记录了最早的一批民间诗歌群体：李亚伟、胡钰、万夏等人创立的“莽汉诗歌流派”，欧阳江河、周伦佑、石光华、万夏、杨黎等人创办的“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石光华、欧阳江河、宋渠、宋炜、杨远宏、刘太亨等人创办的“整体主义”，以及由于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而形成“大学生诗派”，等等。^②这块自古被称作天府之国的富庶而封闭的古盆地，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一块鲜明的精神地标、当代诗歌变革运动的策源地以及大量优秀诗人的输出地。无论如何，这与它壮丽的自然山水以及自古以来的诗歌传统——由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乃至现代的郭沫若所留下的深厚的诗歌气脉——不无关系。封闭的地理反而赋予了它格外巨大的突破力量，富庶的物产则给予了诗歌与诗人得以滋育生长的条件。欧阳江河在回答为什么四川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策源地”时是这样说的：“这很正常，这里天高皇帝远，人们喜欢泡茶馆、吃火锅、闲聊、饮酒、读书，养出了闲适的文人心态，

① 韩东：《关于诗的两段信》，《青年诗人谈诗》，1985年印行，第124～125页。

② 参见“诗家园网站”（http://sjycn.2008red.com/sjycn/article_269_5742_1.shtml）。

同时，这里又有一种很非非和莽汉的东西。这两极的结合造成了书卷气、江湖气、市井气的并存，口语和书面语的交汇，使四川诗歌写作呈现出引人瞩目的现代诗语言奇景。”“四川人很好强，个性很张扬，但又包容，不排外。这些都是四川成为第三代诗歌重镇的原因”。^①

这是1980年代的状况和代表性景观。1990年代之后，尚存的原始自然与地域文化在中国日益加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基本上也陷于瓦解，诗歌中的地理和地理中的诗歌，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和难于把握。难怪像“寻根文学”运动会发生在1980年代，而1990年代“先锋文学”的场域则实现了从原始乡村到现代城市的转换。消费的与娱乐的、欲望的与身体的写作代替了文化的忧思与精神的挽歌，代替了对存在意义及其形式的勘探与追索。但从另一个方面看，1990年代也是民间诗歌群落与流派秘密发育并逐渐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与其特有的“文化缝隙”的扩展——市场与大众文化的发育使民间文化形态有了更多藏身之地——有密切的关系。仅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的统计，这时期出现的诗歌民刊就达到了49家，^②这份名单当然不全，实际数量要多得多。在这个近乎无限大的群体中，“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对于官办诗歌与权力诗坛的僭越，“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地域风尚的倡扬，还有“文学地理”意义上的对于诗歌界某些时尚趣味与精英规则的挑战与解构，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个民间群体的作用下，传统的诗坛权力结构及其价值系统终于土崩瓦解，几乎所有被广泛认可和经典化的诗人，都是从民间诗歌刊物上成长起来，而不再是由原有的发表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从1950年代以来由意识形态架构起来的诗歌生产体制，所谓“当代诗坛”的文化权力结构，被彻底修改了。

在1990年代末还发生了另一场重大的诗歌事件，就是“盘峰诗会”中出现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立。其实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观念之争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分子”，其最初身份都是对照于“权力诗坛”而存在的，他们在1990年代的写作都具有“知识分子性”，而存在的方式也都曾是“民间”的。换句话说，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美学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有微妙的差异。但随着权力诗坛的趋于弱化，他们两者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权利之争”。很显然，身居京城的“知识

① 欧阳江河：《没有了诗歌，就没有了下一个奥斯维辛了吗——答安琪问》，2006年6月12日《经济观察报》。

② Maghiel van Crevel, *A Research Note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07.

分子诗人”是1990年代诗歌参与国际化进程的最大获益者，在政治与文化紧张关系逐渐缓和之后，原有的异端身份随之淡化乃至消失了，而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与翻译的兴盛，则使许多身处文化便利与开放前沿之地北京的诗人，一变而成为声名远播的“国际诗人”。这样，身居外省、几乎与身处京畿的诗人同时成名的那些，便成了相对“被遗忘”的一群。这种巨大的不平衡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刻意放大与前者的差异，夸大同“本土”、“传统”、“民间”、“现实”等场域的关系来扩展其合法意义，进而实现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身份矛盾——即所谓“国内流亡诗人”的说法，以及写作的“不及物性”——的批评，以争取在经典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自身利益。

确实，“民间写作”的这一诉求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在“盘峰论争”及其余波中，民间一派成为获益者，并且因为对于精英诗坛新的权利格局的打破，而为“中间代”、“70后”、“80后”以及“网络写作”一代的粉墨登场创造了条件。借着网络新传媒的蔓延，还有千禧年新世纪的节日狂欢氛围，中国的诗坛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局面。

三 当代诗歌中的“地域性意识形态”特质

以上这番“当代中国民间诗歌地理”的描述，仍然使用了一个“时间叙事”，这也是不得已的，不可能在完全取消时间因素的条件下完成一个历史叙述。我们需要做的，一是尽可能地展开历史过程中的空间因素及其丰富性；二是在建构历史的逻辑与整体性时，尽量避免使用时间意义上的简单价值判断。很显然，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确有这样一个趋向，即它的民间特性、地理文化差异性处在一个“渐趋丰富”的过程中，而这一点也十分符合“进步论”的历史逻辑，这也是客观事实。但这一过程中的空间丰富性，我们确未能充分展开，因此，下面我要对于近些年诗歌的地理属性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首先是“地域性意识形态”的差异。如同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中所阐述的，城市所构成的权力中心支配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而另一些居于边缘地带的区域则要努力冲破这种权威。1990年代后期以来，“外省”与“民间”这类词语的日益显豁即与此有关。“外省”一词本无本土含义，是翻译文学中关于“巴黎”的对应物的一个特殊符号，它几乎是“乡村”或“郊区”的同义语。但随着2000年一份民刊《外省》（河南诗人简单创办）的出现，这一词语在当代诗歌中渐渐被确立了其与“京城”相对的意义。“盘峰诗会”之后的数年间，看起来是“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两种观念之间的对

立，其实就是在这一旗号下“外省诗人”与“京城诗人”之间的分野。因此，“民间”立场及其表达方式——“说人话”的“口语”，还有“本土”的经验内容，便成为与“不说人话”的“雅语”，还有非本土的外来经验，以及现实的不及物状态的内容之间构成了对立的一种形式，并因此具有了另一种“道德优势”。这其实是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力量，它不期然地结合了中国久远的革命民粹主义传统，与日益发育的大众意识形态，并且适应了网络传媒的环境，确立了自己在新语境中的身份与角色，以及价值与位置。

相比之下，“京城”原来由权力层级结构与主流意识形态，还有来自国际汉学的跨国影响，甚至“全球化”的总体文化逻辑所赋予的混合优势，在世纪之交似乎突然丧失了合法性。在延宕多日的论争中，“知识分子诗人”群体似乎显得有些无心恋战，其声言“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歌理想也显得略带悲情。然而这个群体在事实上仍然具有“国际化”的优势，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她穿行、居住于北京、四川两地）等为例，他们在21世纪之后仍是经典化程度最高的诗人，并且日益享有国际性的声誉，每年有大量时间是在欧美与世界各地巡游和访问，这仍然是“外省”诗人们徒有艳羨而无力相比的。如今，两个事实上边界已日益含混的阵营，是以这样一种奇怪的交错与胶着的方式存在着。其中“民间”一派的领军人物于坚、韩东和伊沙等，也都有机会被译介和频繁出访，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已经“国际化”，但是两相比较，“待遇”还是不同：北京的“知识分子诗人”仍然拥有另一种不可动摇的“等级优势”——即全球性的诗歌知识以及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更高级”的阐释空间与可能，所谓庞德、史蒂文斯之于西川，里尔克、纳博科夫之于欧阳江河，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之于王家新，普拉斯之于翟永明^①……人们似乎习惯于在一个世界性、国际化的诗歌谱系中诠释他们，赋予他们一种类比的“优势”；而“外省”诗人便大约只能依据“本土”、“现实”等“地方性知识”来阐释其意义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地域内部的景观。仍以北京为例，在它的大街小巷中活跃着形形色色的诗人群体，他们寄生于各种体制：民间的、官方的、学院的、亦官亦商的、资本与企业主的；身份则上至官员，下至打工者，有小企业主、记者、书商、制片人、IT行业从业者、行为艺术家、冒牌学者、草根画家、行僧或食素者、无业游民，甚至痞子混混，他们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本雅明在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所描述过的“游荡者阶

① 参见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程——序〈岁月的遗照〉》，《山花》1997年第11期。

层”。这个阶层也除非是在今日的北京，在过去或是别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想象他们会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却能够被养活，并且找到自己的生存快乐与发迹之途。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朗诵会与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中，他们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交错构成无数个小圈子，也很快分化甚至反目成仇。因为这样一个环境，北京成为众多诗歌民刊、诗歌组织的温床。在这里活跃着《诗参考》、《诗江湖》、《第三条道路》、《新诗代》、《新诗界》、《卡丘主义》、《小杂志》、《物》、《红色玩具》等比较固定的民刊，也有很难统计的以公开出版的方式面世的同仁书刊；就经济力量来说，北京也通常有着外省很难匹敌的投资者，以中坤集团为例，其2006年开始承诺给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中国诗歌学会、批评家唐晓渡等主持的帕米尔研究院各投资一千万元，这样的投入堪称迄今为止的中国之最。虽然据说投资并未完全兑现，但至少在帕米尔研究院的名义下，“中坤国际诗歌奖”已经举行了两届，其影响堪称严肃和巨大。这类活动所具有的学术含量也是外省无法匹敌的。即使是在上海那样有经济力量的城市里，也很难想象会有一位企业家把巨额的资金投向诗歌事业。

在另一个经济发达、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地区广东，也迎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诗歌繁盛时期。那里资金雄厚，流动人口非常多，但多数是底层人物或是两极分化的人群。但正是在这里，在世纪之初汇聚了众多的诗歌写作者，仅以2005年、2007年由广东官方召开的第一、二届“广东诗歌节”为例，出席的本地诗人就多达两百余人。有人甚至用“诗歌大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其诗人之多、出产作品数量之巨。在这里仅有影响的诗歌民刊，就有《诗歌与人》、《行吟诗人》、《赶路诗刊》、《思想者》、《今朝》、《诗歌现场》、《女子诗报》、《低诗歌年鉴》、《中西诗歌》、《打工诗人》（报纸）等十多家，还有影响广泛的最早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各种诗歌选本。这些民刊有的因为获得了官或商的支持，印装多体面豪华。迄今为止我都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个人们想象中的文化不毛之地竟出现了不可遏止的诗歌热流？资金的雄厚固然是文化滋育的一个基础，但社会生活的丰富奇特似乎才是真正的原因。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确乎发生了太多的故事，积聚了太多的社会心理，有太多的血泪和秘密，有太多不吐不快的人心块垒。从郑小琼的诗里，我们便可以看见这一缩影：在铁一般冰冷的流水线上，在铁一般贫困而无助的生涯中，有千千万万个命运如同铁钉的、经受着锻造与锈蚀的卑微生命，他（她）们忍受着铁一般的生存法则，经历着机器一样枯燥疲累的人生，但他（她）们的内心也燃烧着铁的痛楚与追问，积聚着铁的悲凉与呐喊，铁

的顽强与奋争。正是在这里，在郑小琼的诗歌里，我们看到了工业时代中国底层人群的精神影像与生命创伤，以及以“铁”为经典符号的“时代的新美学”。

显然，是在一块人们想象中最近乎“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社会伦理与诗歌精神中的呐喊，在那块财富迅速积累，江河严重污染的地方，在那块外国的工厂与资本家榨取了我国底层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并创造了一个时代的GDP神话，帮助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美元储备国的地方，出现了这个奇特的诗歌景观：众多的打工者和刚刚脱离打工身份的、出于责任的或者仅仅是跟风的、各色身份的写作者，他们共同书写了当代我国未必是艺术质量最高，但却无疑是最具有现实感和最具良知呼唤力的诗歌。这应当是“当代我国民间诗歌地理”这一命题中最富有启示性与传奇色彩的景观。它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地域美学”——在这块土地上，显然中产阶级的感伤与自恋，花花草草的轻薄与调侃，还有泛意义上的“南方的才情”，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后现代体验，以及“高端”的美学谱系与文化背景等等，都是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问题也不能极端化和一概而论，事实上即便在最为遥远的边地，也有着对等级意义上的“高端诗歌思维”的追求。在众多民间诗刊中，比如黑龙江的《剃须刀》、《东北亚》，四川的《非非》、《存在》，福建的《新死亡诗派》，地理不断迁移的《太阳》、《女子诗报》，还有浙江的《北回归线》，广东的《今朝》等等，也都体现着对于普遍的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诗歌经验及其美学的诉求。特别是存在历史已长达20多年的“非非”诗人群落，他们对诗歌中语言与文化、结构与文本的孜孜以求的追寻与思考，在我国堪称独一无二，他们所构造的“悬空的圣殿”既是社会的，也是文本和词语的、哲学和形而上的，而他们将自己描述为“刀锋上站立的鸟群”^①的角色体认，也在文本之外标立起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立场。这种毫不回避的精神担当，在时下的诗人群落中已显得形单影只。

在大西南的民族地区，也活跃着众多的诗歌流脉与群落，最典型的是在四川与贵州存在了多年的《独立·零点》，以发星为核心，它多年来坚持着人文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他们不但在当代民间诗歌历史与地理状况的资料积累与整理上做了很多工作，还格外关注彝人的汉语诗歌写作、西南的地域性诗歌写作，甚至他们的语言与修辞都带着浓厚的地域性与陌生化风格，

① 参见周伦佑主编《悬空的圣殿》、《刀锋上站立的鸟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这些都为丰富中国当代民间诗歌的地域文化与美学内涵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四 文化地理中的“地域诗歌美学”

如果刻意观察“北京”和“外省”这样两个相对意义上的地理概念的话，在诗歌写作上就可以看出美学上的差别——这当然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危险，但宏观上仍可讨论。混迹北京的诗人最注重的往往是对旗帜的标榜，以及各种形式的实验，这是由于知识信息的迅捷与庞杂所决定的，因此“极限性文本”多半出在北京。如果说外省的诗人可能更注重抒情或者写作的道义担当，那么北京的诗人则最注重形式的实验与探求；如果说外省的诗人有更多“前现代的焦虑”与精神性追求的话，那么北京的诗人则有更多“后现代的智性炫耀”与技术趣味。以2007年问世的《卡丘主义创刊号》为例，这可谓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意味的民刊。很显然，这样一本诗歌民刊不大可能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上海的《活塞》在视觉上也给人以强烈的“后现代式”的震撼，但那是由“鬼魂”与“幽灵”的图画构成的一种荒诞感，是物质生存、经济压迫所带来的焦虑的寓言；而“卡丘”则拼贴了大量革命和“文革”时代的影像符号，它用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画，以强烈的“间离”效果呈现了我们的文化失忆或记忆的碎片感，它更多的是指向政治和文化上的异化性危机。但是显然，它与1990年代的大量类似读物已不一样，不再是单纯追求“政治波普”的效果，而是作用于消费时代的一般性文化感受而已。

“卡丘主义”在文化与美学上都具有十足的兼容性与含混性，它在创刊号上一下子推出了三个“宣言”，这些文字很繁复且很有意味，但读完则使人陷入了茫然。这种迷失感使我不得不放弃试图“理解”和诠释它的冲动——

卡丘主义者认为，卡丘是一场自觉自愿的文化、艺术、流派的运动，也是“反对”文化、艺术、流派的运动。卡丘相信诗歌和艺术的一切，卡丘包容一切……卡丘是整合一切精神资源的探索狂的代名词。卡丘不是要得到什么，不是要成为什么，卡丘是要“从结果回到资源”的诗歌运动，从诗歌的表现形式回到诗歌的本质的运动，从写作者回到读者的运动，从读诗者回到高兴者、有趣者的诗歌运动，卡丘是从疯狂回到宁